

致敬前贤

怀念向达老师

徐自强^①

向达，字觉民，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00年生，1966年含冤去世，享年66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阎文儒、陈玉龙先生主持编辑《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时，笔者仅以先生所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嘉道拓和道光拓）两种为题材，撰写了一篇短文以表达对老师的哀思。现在再撰此篇，以示追忆和怀念。

一

笔者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道南中学任兼职的学校图书管理员时，曾读过向达先生的文章《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发表于《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始知其名。直到1956年，笔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才在系迎新会睹先生尊容。当时教我们《中国隋唐史》课程的是著名的汪篾教授，向先生专长的《中西交通史》，笔者因所学为考古专业而未能选修，故在北大与先生相处的十年中，一直未能系统地听过他的课程，只是在几次专题报告和到先生北大燕南园家中拜访时聆教过几次，现在想来深感遗憾！但是，向先生是阎文儒先生研究生时的老师，阎先生又是笔者的老师，且与笔者数十年来过往甚密；故从阎先生那里，笔者对向先生的生平和为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早在1934年，向达先生在商务馆和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就表现出了突出业绩，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聘请，专门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先生时年仅34岁。这是我国最高学府文科大系对他自三十年代以来，勤奋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又刻苦研究中西交

^①徐自强（1933—2013），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曾任国家图书馆分馆副馆长。

通史所取得的成果的认可。

1939年春，刚从欧洲英国、法国考察回国半年的向达先生，又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聘为“中西交通史”的导师。这时日本侵华战争正酣，北大等高校西迁昆明，先生也携眷从广西迁往昆明，住在离昆明数十里的一个叫浪口村的乡下，只能每两周进城一次，指导研究生学习。后因日军大肆轰炸昆明，北大研究所被迫迁到郊区龙口村，这里与浪口村相距不过数里，先生便得以在家中授课。同时，先生又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开讲“中西交通史”，这就进一步确定了先生在我国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成就和地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生随北京大学迁回北平，住在东四十条的北大宿舍里。这时的向达先生不仅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爱国者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从事学术研究是不行的。于是先生又积极投身到人民的革命洪流中去。他曾在北大多次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1946年12月，暴徒们捣毁北大学生会，向先生厉声疾呼：“你们把北大的脸丢尽了！”要与他们赤膊战斗。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胡适曾多次动员向先生一同迁往台湾，均遭到先生的拒绝；但他却参加了北大护校委员会，并接替毛子水做了北大图书馆馆长。

建国后，向老师不仅踊跃参加政治运动，积极支持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还一反以前“治学不为官”的态度，先后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大校委会常委，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学部委员，《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等职，同时抓紧时间，积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对此，他在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的“作者致辞”中曾这样记述：“从1926年到现在，整整三十年；照古老的说法，三十年要算一世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像我所研究的比较狭隘的一门，虽然只是历史科学巨流中的一个小小溪涧，也自有不少的变化和进步。”“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我只是参加文化史和中外关系特别是和西域的文化关系研究的一个方面。”“这些论文，都是发表过的。此次重印，大体上保持原样，只是有大错误处略加些许改正，或加几条补注。三十年的岁月，一晃便过去了，检查自己的工作，不胜惭愧之至。”等等，于此可见，一个学术大家，心胸多么开阔，态度多么谦虚啊！

二

1965年，笔者在北大历史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本应到相应的文物单位从事专业工作，没想到被派到文化部后，就被当时北京图书馆的左恭副馆长“硬劫”到了图书馆，分到善本特藏部任职。对于一个学先秦田野考古的人来说，这可算是一个大改行。好在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后，我又从北京图书馆的事业中开拓了新的视野。

在我负责筹备新馆的规划工作中，探寻国图历史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带领一个组，查阅了国图的所有文书档案，编写了国图简史初稿《图书府库》（稿本未刊）。从中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国图人和事，尤其是熟悉大量老馆员、老学者的机会，对向达老师这位北京图书馆的老前辈，我从另一个角度也加深了认识。

向达老师出生在湘西沅江与溆水相交的溆浦县，这是湖南雪峰山以西的偏远山区，也是少数民族土家族集中居住地之一的穷乡僻壤。那里生产落后，经济不发达，群众生活不富裕。他出身于清朝一个小官僚之家，幼年曾随父到广东梅县上任；父亲去世后，只得随不识字的母亲返回家乡上学。因家境日趋贫困，故向先生小学、中学都能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功课优秀。中学毕业后，他先考入河南高师数理化部学化学，后改学文史，由于勤奋好学，很得柳诒徵教授等学者的赏识。

大学毕业后，先生于暑期中就考入商务印书馆作了临时编辑。由于先生在文史和英语方面都有超人之处，假期结束后得到该馆聘书，任英文见习编辑。在工作期间，他总是能很好地完成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和编辑部主任何炳松先生等提出的编辑百科全书的要求，工作成果突出。他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外，还和梁思成先生一起翻译了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并独自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印度现代史》等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1929年的三年时间里，这个不足30岁、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就发表论文和翻译文章15篇，可见其学习之刻苦敬业、研究之积极，十分可佩。

1930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西四文津街七号）落成，向先生在商务工作之业绩受到尊重，经北图赵万里先生介绍，受聘出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这时，先生充分利用北图的便利条件，经常向冯承钧、陈垣等知名学者请教；与学者赵万里、王重民、孙楷第、贺昌群等商讨、切磋，学术造诣日益精深。

向达先生的勤奋努力，以及他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使他深得当时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的器重。1934年，北平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等机构达成互换馆员进行学术

交流的协议时，袁馆长首先就选派了他与王重民到英、法、德进行学术考察。

1935年向先生到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致力于敦煌卷子的研究工作。他用抄录加拍照的方法，从1936—1939年，在英国看了500个左右的卷子，又到巴黎看了伯希和劫走的卷子。由于有了这些材料，先生于1936年写出了《牛津（英国）所藏之中文书》一书，其中记有《永乐大典》12册，以及明版书200多部。又于1937—1939年先后写出《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两书，其中收录敦煌俗文学作品近49篇。此外，先生到德国看了从新疆劫去的石窟壁画和唐人写本，同样作了记录，还把劫去的《太平天国文书》抄录了几大本带回国内。

1938年秋，先生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宝贵资料回国。1939年至1940年6月，先后发表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2月出版），《瀛涯琐志——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6月出版）等。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有幸代表国家图书馆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建工作。1983年该会正式成立后，申请组建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北京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经教育部和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于1987年秋正式成立，笔者又被任命为该中心负责人。

其后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有一项任务就是筹组“敦煌吐鲁番学者文库”，为每一位学者建立一份档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我再一次有机会去了解向达老师等老一辈敦煌学者的有关情况。

向觉民老师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时间较早。还在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翻译了勒柯克《印度现代史》（1929年）一书，认识了佛教产生的源头——印度。同时还翻译了《高昌考古记》，开始了对西域吐鲁番的了解。1930年到北图工作，1935年被派赴欧洲作交换馆员，考察有关情况，如前所述，向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又进了一大步。

1933年，向先生在《燕京学报》专号发表了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是他一生学术的代表作。内容计有正文八则，附录二则，精辟论述了于阗、龟兹和昭武九姓各国居住中国的西域人；阐明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阿罗本当是罗马东徼(Roman Orient)

之人，其他僧人也是中亚人；指出长安西市之胡店与胡姬，及开元前后之胡化；还论述了由西域传开之画派与乐舞，介绍了胡人入中原之姓氏等等。先生此著证实了唐代之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唐人之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之亲密交往关系，至今仍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

1941年，先生受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之约，赴河西，入敦煌，考察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仍是一片榛莽荒芜之象，令人痛心疾首。先生在千佛洞仔细考察先民手创的绚丽多彩的塑像与壁画艺术，同时还去安西万佛峡考察。考察结束返渝后，他很快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首先提出敦煌千佛洞应收归国有，交与学术机关管理，希望学人支持，国家重视。由于先生等人的大力呼吁，于是有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1943年，向先生任中研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次赴河西敦煌考察。这次除再次考察千佛洞壁画艺术外，还在敦煌南沙山进行了发掘。虽然先生提前返渝，但考古工作直到1945年才结束。

1944年12月，先生在北图《图书季刊》新第五卷中发表《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文（1944年12月出版）。文中详考寿昌县遗址，即今南湖东北附近之旧城址。

1945年，先生又写出《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一文，以“方回”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一卷第四期。此文是在1943年写的《玉门关阳关杂考》的基础上，于此年三月修订而成，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373—392页）。文中详考阳关即今南湖古董滩西之西寿昌城，玉门关即今南湖北之小方盘城；文中还详论了隋唐之玉门关即安西之苦峪城。后来夏鼐所长和北大阎文儒教授又在小方盘城发掘出“玉门都尉”汉简，确证其为玉门关城址无疑。

1943—1944年，先生还撰有《西征小记》（瓜沙谈往之一）一文，当时未能发表，建国初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一期（1950年7月版）。

1951年，先生写出了关于石窟方面的最后一篇文章《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瓜沙谈往之三），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5月31日出版）。文中论证了由武周“李君修佛龕记”中之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时的相关事迹，证明莫高窟开窟于苻秦建元二年（366），认为榆林窟开凿时间与莫高窟的开凿时间应该相去不远。文中还对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进行了阐述。

向达先生对河西敦煌事迹的考察研究工作，在他的论文集《唐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时写的“作者致辞”中有一段很好的总结，他说：

从1926年到现在，整整三十年；照古老的说法，三十年要算一世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像我所研究的比较狭隘的一门，虽然只是历史科学巨流中的一个小小溪涧，也自有不少的变化和进步。举“敦煌学”为例。自1899年发现了敦煌石室的藏书以后，便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添上了一个新的部门。我之参加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最初是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入手的。开始接触到佛曲这样一个名词，于是追溯到音乐方面，提出了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后来逐渐明白佛曲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中的变文是两回事，佛曲与龟兹乐有关，而变文一类的通俗文学乃是唐代通行的一种讲唱文学即俗讲文学的话本。1937年在巴黎看到纪载俗讲仪式的一个卷子，这一个问题算是比较满意地解决了。1942年至1944年，得到机会去巡礼敦煌千佛洞，考察汉代的玉门关和阳关的遗址；1951年又去新疆，巡礼了古代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拜城）诸地的石窟寺；于是对于“敦煌学”才算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距我开始作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敦煌学”，特别是音乐和俗讲文学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步。日本高楠顺次郎、法国伯希和和日本林谦三诸人根据印度的七调碑，证明了并且修正了我所提出的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关于俗讲文学，郑振铎、王重民、孙楷第、任讷、周绍良、王庆菽诸位先生，在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传布方面都作了很好的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从笔者接触到的以上几个方面，得到的对向达先生的有限的了解与认识，可以看出：在学校他是我们的好老师；在国家图书馆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前辈；在敦煌吐鲁番学的调查研究方面，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还可称是我们治学的引路人。总之，向觉民老师作为一位土家族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在学识上对中华民族（其中大量的还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如此深邃的造诣，在个人品性方面有如此多的优点，如：政治方面，强烈的爱国热情；修养方面，勤奋、刻苦、谦虚的态度；治学方面，实事求是，重调查、重材料，严谨的科学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是我们应该永远怀念的导师。

2010年仲夏于京华漏痕室